

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唯 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进一步向华北进攻，爆发了芦沟桥事变。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压力下举行了庐山会议，召集各界人士会谈，决定抗战。旋即在南京组织对日作战大本营，全国各界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踊跃参加。这样，神圣的抗日战争就展开了。

当时大本营作战组的某些负责人，根据敌我基本情况，对敌我战略方针，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逐步蚕食政策，和它这种政策相适应，它在战略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方针。所以，当它挑起芦沟桥事变时，一方面引诱宋哲元等谋作地方事件解决，以便达到它不战而略取华北的目的；一方面调集重兵，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针，先解决华北，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进一步压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

它之所以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是因为：它的兵备虽强，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贫乏；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义战争是失道寡助的，帝国主义国家间又有矛盾，若长期战争，它怕引起第三者干涉。所以，它只能采取速决歼灭战略。而我国军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

土大，資源丰富，国家潜力大；并且我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有哀兵必胜、得道多助等有利条件。故我利于采用持久消耗战略。

根据上面分析，我們的战略方針应该：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应尽量使战争全面化；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針，应利用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消耗战略。这些意見，在当时大本营得到許多人的同意，就成为当时指导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思想。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中国决心抗战，它的不战而屈和企图事件局部化的阴谋不能实现时，就一面加紧进攻华北；一面到处挑衅，并于八月九日发生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借口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撤退上海保安总队，压服中国各地的抗日运动。我为扩大战场，造成全面抗战的形势，就乘机主动把駐在苏州的张治中部三个师迅速馳援上海，迎击敌人对上海保安总队的进攻，展开了“八、一三”的上海抗战，迫使敌人逐步向上海增援，打乱了它的整个作战计划，使它陷于被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原来声言三个月就可把中国打垮，誰知在上海一战就打了三个月。它先后由一万左右的兵力逐次增加到二十多万人，使用在上海战场的大炮有三百余門，战车二百余輛，飞机二百余架。不但不能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而且深深地陷入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泥淖之中。

上海一战，对整个抗日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很大的价值。首先，上海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有利于全国总动员；其次，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上海抗战可以扩大帝国主义国家間的矛盾；第三、上海是国际观瞻所在，在这里进行坚强的作战，可以正国际間对中国的视听；第四、打乱了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了主动；

第五、上海是我国工商业中心，羣众觉悟程度高，羣众运动的影响可以振奋全国；第六、可掩护沿海各省工业、物资向远后方撤退。因为有上面这些原因，对上海一战大本营作战组是主张适当地硬拼的。否则叫别人看我国象豆腐一样，就是有心支持我们的人也将丧气而袖手旁观了。

当时上海作战也确是打得有声有色的。羣众热烈支持，所有爱国人民都踊跃支援前线。所有江南各省的兵力，都逐渐集中在上海战场，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各省的部队都参加了作战。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使用在华北战场作战的以外，如张治中、陈诚、胡宗南等部也都在第一线作战。所有爱国官兵，都前仆后继地发挥了最大的牺牲精神，给了敌人以应有的损失。特别在罗店、大场两个地区的争夺战，表现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战斗精神，各国军事观察家都对中国军队的牺牲精神和战斗能力有很高的评价。日本侵略者原来满以为只要三个月就能把中国打败，结束战争。在它这种错误估计之下，就不能不逐次增兵，一再被动。起初，它想以战术包围来包围我上海部队的左侧背，结果演成罗店附近的争夺战而不能成功；后来对大场附近举行中央突破，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在战事迁延不决的情况下，它又不能不大举增兵，改用战略包围由杭州湾登陆，对上海阵地进行远后方的迂回。

在这种形势下，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战组组长刘斐曾向蒋建议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及时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战斗力。十月初旬，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对前线各部队向吴福线转移的命令都已下达，前线已开始执行。但在下达转移命令后的第二天下午，蒋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紧急会议，说根据外交部的意见，九国公约国家正在开会，只

要我們在上海能够繼續頂下去，九国公約国家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要收回撤退成命，要各部队仍在原陣地死守。当时，白崇禧、刘斐表示反对，认为既然已下达轉移陣地的命令，各部队已經开始行动，在敌人的強大压力下要部队再回原陣地，一定会引起混乱，結果将不可收拾。蔣介石坚持不肯，說他可亲自赴前綫說服各部队。于是他当天晚上就赴前綫，并要白崇禧和他一道去了。听說他在前綫某地(地名記不起了)，和一部分的部队长說，九国公約国家會議的結果，一定会制裁日本的侵略行为，只要再坚决死守一下，战争就可早日結束云云。

这时，第一綫各部队，有的正在准备撤退的，忽然又要停止撤退；有的在接到撤退命令后已退却在途的，又要返回原陣地；还有的已經撤退在途而沒有接到返回原陣地的命令的，仍照旧后撤；这自然就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加之战斗激烈，脱离敌人已不容易；已脱离敌人又要返回原陣地去，自然更不容易。这还能有不失败的嗎？

这样指揮錯乱的結果，原陣地既站不住脚，迨十一月初敌人由杭州湾登陆，进行側背迂回时，想把部队向原陣地后方稍撤，即把右翼(原中央兵团)撤到青浦、白鶴港之綫，結果也站不稳脚。于是左翼兵团又不能不連帶一起向吳福綫既設陣地轉进。这时受敌机动性較强的海陆空軍的追击，部队不能不尽量疏散，就使原来已經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加之既設陣地綫上既沒有設留守部队和响导人員，也沒有工事位置图。部队轉进到来后，找不到工事位置；找到了工事位置，又沒有打开工事的钥匙。以致在敌跟踪追击的情况下，沒有占領陣地的余裕時間。因此，在吳福綫上還沒有站稳脚时，敌人已从吳福綫的兩側(平望、福山、澆浦)进行威胁，只好

繼續向錫(无錫)澄(江阴)綫既設陣地撤退，終于在錫澄綫也站不住脚。这种被动撤退的慘局，完全是蔣介石沒有战略战术常識，一个劲依賴九国公約制裁日本，沒有及时調整战綫，爭取主动来坚决执行持久抗战方針的結果。

这样一来，南京防守問題，就出乎意料之外地提前提到日程上来了。

二

战局的演变，使蔣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吳福綫和錫澄綫国防工事，絲毫沒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問題。蔣为解决這個問題，在十一月中旬連續召开了三次高級幕僚會議。

第一次會議只有何应欽、白崇禧、徐永昌、刘斐等几个人参加。当时刘斐的意見是：認為上海会战后期沒有貫徹持久消耗战略精神，沒有适时調整战綫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不應該在敌海陆空軍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胶着太久，且依靠九国公約，把战略作了政略的牺牲品，致自陷于被动。我軍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則，不應該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爭勝負，而要从全盘战略的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如果拖到日本对占領我国的每个县要出一个連、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它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它就非垮台不可。

刘斐对于南京的防守問題，認為敌人利用它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軍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綫前进，机动性既大，后方聯絡綫很便利。而南京在长江湾曲部內，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軍封鎖和炮击南

京,从陆上也可由蕪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綫,然后以海陆空軍协同攻击,則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我軍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經過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經過相当长时期的补充整訓,不能恢复战斗能力。基于我軍当前的战斗任务,为貫徹持久抗战方針,应避免在初期被敌強迫决战。故应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爭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及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爭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的打击。针对以上的情况判断,刘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爭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对兵力使用上,刘主张只用十二个团,頂多十八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

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刘斐的意見,說應該这样做。何应欽和徐永昌也說有道理,但他們素来是矜持老成,只說三两成似是而非的模稜两可的話,尽量在揣摩蔣介石的心理上下功夫的。蔣介石也說刘斐的看法很对,但又說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應該守一下的,至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当时他没作明确的决定。但对上海作战中损失大的部队,他說应一律調到后方整补。

蔣这次的决定,虽然是模稜两可的,但决定上海作战损失大的部队調后方整补,則同对南京只作象征性防守的方針还是符合的。因当时估計吳福綫站不住脚,已指导在吳福綫的部队尽力掩护占领錫澄綫之后,即向苏皖边境的广德、安吉、孝丰等地轉移。只七十八軍宋希濂是調到南京整补的。胡宗南的第一軍則在鎮江附近整补,在掩护南京防守部队占领陣地后,即向长江北岸轉移。

过了两天,大約是十一月的十五、六,接着开第二次高級幕僚

會議。參加的人比上次多一點，除了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劉斐之外，還有唐生智、谷正倫，另外還有一个人，姓名記不清了。談到守南京的問題時，唐生智主張南京非固守不可。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國首都，為國際觀瞻所系，又是孫總理陵墓所在，如果放棄南京，將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劉斐仍主張只用十二至十八個團的兵力，作象徵性的防守，并把當時敵我形勢談了一通。實際當時主力部隊已下令向廣德、安吉、寧國一帶退却，連陳誠、顧祝同等都已到皖南一帶去部署部隊的整補工作去了。蔣在這次會上又沒有作肯定的決定，也沒有要改變以前的部署，只說“孟瀟（唐生智的號）的意見很對，值得考慮，我們再研究研究罷！”

又過了一天的晚上，接着開第三次幕僚會議。唐生智仍堅持固守南京。蔣介石明確地同意他的意見，并問：“誰負責固守南京為好？”這時沒有一个人作聲。最後唐生智打破了一時的沉寂，堅決地說：“委員長，若沒有別人負責，我願意勉為其難，我一定堅決死守，與南京城共存亡！”蔣說“很好，就由孟瀟負責。”蔣并望着何應欽說：“就這麼辦，有甚么要準備的，馬上辦，可託孟瀟先行視事，命令隨即發表。”

蔣在決定固守南京的方針後，一面決定遷都重慶，表示要長期抗戰，但同時並沒有放棄投降活動。那時日本空軍已對南京進行過三次空襲，其中有兩次投彈在中華門外的飛機場。所有中央機關各部門都已紛紛遷往武漢，只有很少數的人還在南京。蔣為避免敵機襲炸，住在中山陵下邊樹林蔭蔽的“四方城”的一幢極小的房屋里，全部只有兩間小房。蔣吃飯、會客、辦公，都在一間小房里。汪精衛却住在中山陵園他自己的房子里，勾結德國大使陶德曼作投降活動。他一方面對蔣介石建議投降，一方面找作戰組探

听军事消息。当他晓得前线部队溃退下来的紊乱，乍(浦)嘉(善)吳福綫上站不住，乃至沿太湖南岸西进的敌人将向南潯压迫，迂迴錫澄綫的后方，或直驅蕪湖截断南京后路等情况时，就乘船去汉口了。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在武汉发表过关于迁都的談話。

蔣介石决定了南京防守方針后，唐生智在十一月二十日先行到职(命令二十四才发表)，組織南京卫戍长官司令部。首先把七十八軍宋希濂部由第三战区预备序列調归卫戍部序列，并准备調六十六軍叶肇部也参加防守南京，此外参加防守的还有原在南京的教导总队、宪兵团等。防守計劃大体分作两綫配备。即一部占领自京蕪路上的大胜关起，至淳化鎮、湯水鎮、龙潭这一弧形綫的前进陣地。主力占领复廓陣地，就原有永久工事增強成为閉鎖式或半閉鎖式陣地。在防御方針上則已改为固守性防御了。大約是二十七、八日左右，敌人已經越过錫澄綫繼續西进一两天的样子，蔣介石以計劃已定，让作战組的人先走，他說他准备坐飞机走，还緩些时沒关系。后来蔣介石在南京又大大增加了防守南京的部队，就地由东战場第三战区序列抓去的不算，連在武汉的第二軍团徐源泉部也正在向南京輸送中(后来这个部队到十二月八日才在南京煤炭港最后登陆完毕，立即投入火綫，到十二日晚又向老家湖北麻城逃跑)。同时傳聞汪精卫还是搞了一幕投降活动，听說由外交部次长徐謨陪同陶德曼到南京去同蔣介石談过“和平”条件(詳情不明)。

三

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以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燦为参謀长。从他坚持固守南京的一切姿态来看，象煞是有

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的。唐就职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新聞記者談話,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屬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在唐生智以固守南京为目的的方針指导下,就尽量要求增加兵力,蔣介石把一切可以調得动的兵力,都調去防守南京,以致兵力愈增愈多,共計达到十多万人。蔣介石在离开南京时,曾召集守軍高級將領講話,要他們死守;并告訴他們一个好消息說,現在云南的部队已經在开拔途中,只要他們死守下去,不久他就会亲自率領強大的軍隊来解他們的围,歼灭入侵的敌人,光复国土云云。

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的必死决心,还要交通部长俞飞鵬把下关到浦口間的渡輪撤退;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軍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第一軍,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軍人个人,都請制止。如有不听他們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那时日軍对南京分三路进攻:右路敌主力沿沪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經溧阳、句容攻南京;左路由太湖南側西进,先攻广德、宣城趋蕪湖,截断南京守軍退路,再向南京合围。十二月四日右中两路敌人攻陷句容、秣陵关,向南京外围陣地猛攻,至十二月八日先后攻陷淳化鎮、湯山、龙潭各地。这时,敌左路也攻陷蕪湖,即北向于十一日陷当涂,繼續向南京攻击前进。南京外围前进陣地守軍已逐次退入复廓陣地固守。

占領南京外围陣地的敌人,从十日起对复廓陣地展开猛烈的攻击,集中步、炮、空协同的威力对各城門猛轰。当天下午就有一部分敌人窜入光华門外廓,經尽力反击,到黄昏时才把窜入的敌人

打退,搶修好被襲毀的城牆缺口。繼續戰鬥到十二日正午,敵主攻方面的雨花台被敵攻陷。那里的守軍八十八師孫元良部由城牆爬進城內,徑趨挹江門,企圖由下關渡江脫逃。經衛戍司令部指定的戒嚴部隊宋希濂部堵攔,收容約二千人,仍由孫元良率領回中華門附近作戰。到下午四時許,俞濟時部七十四軍又由三汊河向下關搭浮橋,作向下關撤退準備,又經戒嚴部隊請示上官部制止。這時,敵雖猛烈攻城,雨花台和紫金山第一峯據點被敵占領,但戰鬥並沒有到最后分曉階段,至于說到“固守南京”或給予敵人應有的損失,自然更是談不上。

可是,據說就在當天下午五時左右,唐生智突以征求各部隊長意見為名,召集了一次會議。在會上也沒有經過任何討論,就命令參謀長周燭把油印的突圍命令交付各部隊長,只說了聲“照命令規定的辦!”命令指定宋希濂的七十八軍掩護上官部直屬部隊在下關渡江后繼續渡江;其余部隊由正面突圍。真是說時遲、那時快,自告奮勇要死守南京的唐生智,馬上同幾個重要人員登車駛向下關渡江去了。聽說當他船到江心,却被守在浦口的第一軍擋駕。即根據他自己原來的通知不准任何軍人渡江,嚷着要開槍射擊。經過再三央告,才讓他登上了北岸。

當天夜晚從挹江門到下關一帶就進入了混亂狀態,渡江船只又少,當宋希濂隨直屬部隊第一批渡江后,再把船只放回南岸繼續渡江時,只見人人爭渡,個個搶先,于是有的船因載重過量沉沒了,有的船渡到中流又被岸上沒擠上船的開槍射沉了,連掩護渡江的部隊也有許多過不了江。同時上官部草率的指示突圍,有的部隊並沒有人到會,也沒有接到突圍命令,如徐源泉的第二軍團,因戰鬥中被敵炮把通信綫打斷了,同上官部失去了連絡,用電報同上官部連系又得不到回電,直到當日(十二)夜半才從避難的船伏口

中知道下关紛紛撤退的情况,就独断由龙潭附近渡江向合肥撤退。本来十二日入夜以后,战况非常沉寂,反是南京守軍在下关自相践踏,乱得不可开交,使許多人淹沒在江里。因为許多部队并没有由正面突围,一起拥到下关去了。实际既然这么一打就要突围,当初又何必向复廓陣地撤退呢?岂非多此一举。自然在自己国内作战,由正面突围倒是比較安全的。如六十六軍叶肇部就是抱定与其淹沒在江心,何如与敌一拼的决心,就由太平門出城,經紫金山北麓,沿途同敌人虽有过几次遭遇战,終于經句容、溧阳安全到达宁国集中。

当时,有些部队沒有把突围命令传达下去就一走了事。所以到十三日,敌人既沒有进城,下关一带还在紛紛地搭木筏搶渡,自相践踏,有的淹沒到江中去了。也有許多失去了官长率領的士兵,徘徊在南京街头,象无舵漂船不知往何处去好;有的只好向难民国际委员会交出武器請求收容了事。守南京的十多万大軍,就这样象尘土一般一陣风吹散了。至于敌人进入南京后,大肆劫掠、屠杀,牺牲我几十万无辜人民,写下了史无前例的野蛮记录,姑不在这里說了。

在蔣介石的投机性和錯誤的战略方針指导下,使上海会战陷于被迫撤退,敌就跟踪追击,一举直迫南京而占領了南京。国軍主力損失惨重,多数已不能成軍,給尔后抗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困难,是无法估計的。如果蔣介石在上海会战后期,不对九国公約存有幻想,不改变及时主动撤退的决心和已下的命令,适时保全实力,主动轉移到吳福綫上,就能利用永久工事,更能繼續消耗敌人。即使还要从吳福綫后退时,也可以利用錫澄綫及鎮江以西的山地,繼續抵抗,而南京附近的作战也不会如此迅速地到来。就是打到南京来了,如果只用少数部队作象征性的防守,把大部分兵力控置

在南京外围,利用外线有利态势,实行机动作战,亦可以争取較多的时间,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因为上海会战后,南京和徐州已成互为犄角的形势,如果保持主力在南京外围,敌就不能从南京抽调兵力去攻徐州。徐州也不会在南京失守后不到半年就过早失守,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也决不会很快发生。这样,我就可保有平汉、粤汉、陇海、津浦各铁路和长江等交通大动脉,来维持和补充战力,增补第一线的打击力量,继续赢得时间。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局的演变,也会和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南京过早淪陷是蒋介石一手种下来的恶果。为甚么对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会这样儿戏对待呢?据事后所闻,因当时汪精卫主“和”,所以他主张固守南京。他认为日本人是要逼中国为城下之盟,不会真正进攻南京。如果它攻下南京,则战争非长久打下去不可,“和”的文章就做不成了。这是汪的看法。蒋介石呢,他本来没有抗战的决心,不过为了他个人的地位不得已才抗战。因此他一味想投机取巧,在上海作战时想依赖九国公约制裁日本来达成和局;到南京作战,又想依赖汪精卫和陶德曼搞“和”,想以固守来达到“和”的目的。总之是没有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在战争指导上处处被动。唐生智之主张固守南京,并自告奋勇要与南京共存亡,据事后传闻,也是幻想日本侵略者不会真正攻南京,或对南京采取攻而不下的政策,以逼蒋为城下之盟,并揣测蒋介石是会接受的。那么,他死守南京就可以功成名就,坐享其成。到日本侵略军拿出真刀真枪进攻时,他就在三十六计之中,马上选择了“走”的上计而溜之大吉。

这样一来,蒋介石想利用唐生智死守南京,以使为他依赖陶德曼和利用汪精卫搞“和”服务的目的就完全落了空。蒋这一气,可真是非同小可,所以在以后抗战的全期间再也不使用唐生智了。

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宋 希 濂

一 抗战开始蒋介石就无决心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件发生后，蔣介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于十七日在江西庐山宣布对日抗战。他对芦沟桥事件的解决，采取了较为強硬的态度；并云“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責任。”虽然这样，是不是可以说蔣介石对于抗日确实具有决心了呢？不，蔣介石在战争的开始就是沒有决心的。我写这篇亲历記，是要用鉄的事实来証明蔣介石在抗战一开头就是动摇的。

八月十三日上海战争爆发，一直打到十月底。蒋介石调动了七十三个师参加上海战场的作战，占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能

立后备部队，临时征調兵員，緩不济急。这些新兵又未經过訓練，如何能从事这样复杂和激烈的战争呢？参加上海作战的各师，絕大多数到十月中旬已伤亡甚重，每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少的只有二、三千人。当时主管作战的軍事委员会第一部（以后改称軍令部），鉴于已被日軍攻占浏河、刘行、江湾、閘北、真如等地，后方又无兵力可以增援，主张迅即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撤守福山、常熟、苏州、吳江至嘉善、乍浦之綫，以有力的一部占領江阴、无錫至嘉善、海盐之綫，从事整补。这两条綫是既設陣地，輕重机关枪掩体，星罗棋布，全是鋼筋水泥做的，还有許多半永久性的工事。这是国民党軍事委员会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約两年半的时期內，派了三十六师、五十七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等四个师和几个工兵团构筑的。如果及时撤守这两条綫，一方面可以节约兵力，使許多部队得到补充和整訓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可迟滞日軍的前进，以空間换取時間。“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虽然丧失了若干土地，但我們是个大国，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以爭取最后的胜利。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蔣介石如果真有抗日的决心，是沒有理由拒絕这样做的，但他却把这个計劃擱置不理。他于十一月一日晚由苏州乘火車到了南翔附近，同来的有白崇禧、顧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將領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开会，除以約半小时的时间听取了几个高級指揮官的战况报告外，蔣介石講話約四十分钟。他講話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而尤侧重于后者。前一部分他概括了“八一三”以来敌我双方作战的經過和国际間的一般反应，并对前綫官兵的英勇斗争作了一些表揚和鼓励。紧接着他就說：“九国公約會議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會議对国家的命运关系甚大。

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反复地阐述这番话,语气也很坚定。说完他就走了。

十一月五日晨敌以军舰多艘炮击金山县属金山卫一带,掩护海军陆战队在漕泾镇、平湖县全公亭及金丝娘桥登陆,同时以敌舰数艘,向海盐城及乍浦岸上炮击。敌军登陆后,分两路进犯,一路由全公亭趋新仓,一路由漕泾镇及金丝娘桥登陆者在黄埭会合趋张堰镇。六日抵松隐镇,七日占米市渡,八日敌军窜至石湖荡、张庄市,进陷松江。侵占松江之敌,以一部沿沪杭铁路向上海前进,以主力疾趋青浦、南翔,企图将在沪西北区的国民党军队加以包围歼灭。自“八一三”上海战争一爆发,我就率所部第三十六师(约一万人)投入战斗,在江湾天宝路一带,与敌军周旋了两个多月,无日不战,伤亡逾万。这一期间曾有三个补充团拨给我师补充,有许多士兵姓名尚未登记,便在阵地上牺牲了。当时的战斗确是很激烈而紧张的。十月二十八日,奉令撤到苏州河南岸据守。我的指挥所设在沪西的罗别根路,敌军曾数次施行强渡,均被我击退。至十一月六日,敌又集中优势炮火轰击我阵地,掩护其工兵进行架桥作业,随着敌步兵强渡成功。我军仍在河畔逐点据守,阻其扩大,但战况已益趋严重。因当时所有退守苏州河南岸的部队均伤亡甚大,又无兵力增援。我原归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朱之前任为张治中)指挥,退到苏州河南岸后改归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指挥,他的司令部设在青浦附近。九日下午六时,张发奎和我通电话,说“委员长命令我军务必在沪西再支持几天”。但到八时,张又突来

電話，命本師于当晚立即向昆山方面撤退。九日这一夜的退却，簡直是紊亂极了。因为自沪西經青浦、南翔至昆山一带地区，全是河汊纵横，沒有一处可以徒涉，只有一条公路可走。所有部队全沿着这条公路向西去，大家爭先恐后，拥挤不堪。各级指揮官对自己的部队完全失了掌握。自青浦至南翔間的苏州河大桥被敌机炸毀了，所有車輛无路可走，拥塞于途。加以深夜过青浦时，西南方向机关枪声很浓密，說明日軍已迫近青浦。大家为避免使自己部队陷于敌军包围圈，更是拚命向前赶，形成极度的紛乱。敌军編組了几个小規模的挺进部队，从青浦以西地带挺进到苏州河北岸的南翔至昆山間公路上。胡宗南的第十七軍团司令部在南翔西南角的苏州河畔，遭受敌軍的偷渡袭击，司令部人員及警卫連被打死者甚多，胡宗南只身逃出。薛岳(那时任第十九集团軍总司令)乘小汽車自南翔前往昆山，被敌军机枪扫射，司机和他的一个卫士被击毙，薛岳从車上跳到一条河沟里，幸免于难。我于十一日在南翔附近将部队收容掌握后，于是晚越过沪宁鐵路以北地区繞道前往昆山。到达昆山时，陈誠的总指揮部(陈誠那时担任前敌总指揮)已經撤走，那里只有一些找不到自己单位的小部队和潰散的士兵。我得不到任何指示，便率部退往苏州。大約是十七日黄昏时到达苏州的，这个古城已是死一般的沉寂，街上店門紧閉，閤无一人。我走到電話局去，和在无錫的顧祝同(顧那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負东戰場指揮之責)接通了電話，他叫我迅即开到无錫去。当晚繼續西行，于十九日正午到达无錫，即往見顧祝同。他告訴我，軍委会命令三十六师立即开南京，運輸部队的車輛已通知鐵路局准备，要我速往接洽。同时他对我說，这次撤退很仓促，許多部队弄得十分凌亂，致不能按照預定計劃占領陣地阻止日軍的前进，苏州已于

本晨失陷，情况很紧迫云云。不久无锡、武进、宜兴等地相继陷敌，国民党军队毫无抵抗，敌军长驱直入，很快就进抵南京附近。这次撤退的混乱，在战史上是罕见的。以这样大的兵团，既不能进行有组织的逐次抵抗以迟滞敌军的行动，又无鲜明的退却目标，造成各部队各自为政，拼命地向西奔窜。战场统帅部对许多部队都不明白其位置，遂使敌军如入无人之境。各级指挥人员没有适当的退却部署，不能切实地掌握部队，当然要负丧师失地之责。但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在抗战的开端就没有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希望依赖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施加压力后，与日本进行丧权辱国的和谈以谋结束战争。以这样的主导思想来指导战争，所以弄得一败涂地。

二 唐生智表示死守南京

我率残部三千余人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到达南京，下午四时往见蒋介石。他这时住在中山门外四方城的一栋小平屋里，为的是避免敌机的轰炸。我见他时，看出他的脸色憔悴苍白，情绪却很紧张。他向我询问部队的实力情况以及沿途所见情形后，就说：“调你回来，是要你参加守卫南京的任务，归唐司令长官指挥。何部长尚在南京，需要补充的兵员武器器材等，可即向何部长报告。”我在蒋那里出来后，即到三牌楼军政部见何应钦，这时军政部绝大部分人员都已迁往武汉，仅有少数人员随何留京。这位何部长实际上是一位亲日派，他是一贯不赞成对日本采取抗战政策的。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军的挑衅进行英勇抵抗，我那时任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率部驻南京，曾向何应钦要求开往上海参加作战，何不许；我率干部三十余人于一个深夜闯入何